

清代乾嘉汉学的兴起及发展

雷 珂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2019 级, 中国·山西 临汾 041000

【摘要】乾嘉汉学是清代占据主导地位且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派别,其兴起主要有外在客观环境的影响和内在学术自身发展的原因。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乾嘉汉学作为一代学术思潮已到达鼎盛。

【关键词】乾嘉汉学; 兴起; 派别

有清一代,相比较于注重义理的宋明理学走下神坛,学界渐兴以训诂、考据为中心的研究风气,至乾隆、嘉庆两朝达到全盛,产生了所谓“汉学”,并最终达到了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相比肩的学术高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或派别,因其治学内容和治学方法与汉代学术相近,故相对于宋学被称为清代“汉学”。

梁启超、王国维、钱穆等都对清代学术分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梁启超按照佛教生、住、异、灭四期把清代学术分成了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四个阶段,“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三百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王国维则将其划分为顺康、乾嘉、道咸以降三个阶段,“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而钱穆在《清儒学案序目》中则从理学角度出发概括为晚明诸遗老、顺康雍、乾嘉、晚清 70 年四个阶段。追溯其发展脉络,乾嘉时期汉学复兴为当时的学术主流,出现了在学术发展史上据有一席之地的乾嘉学派,其兴起必然并非是偶然的历史现象就可以解释,更多的应是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1 乾嘉汉学的兴起成因

关于乾嘉汉学的成因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各有见解,总的来说可将其归结于两大方面即外在客观因素和内在学术自身的发展,以及三个因素即政治、经济和学术发展。

1.1 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

自清军入关后,为稳定政权,清政府自顺治元年至康熙十一二年以后的时间里,曾先后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了利用、高压以及怀柔政策,其中高压与怀柔政策的实施对当时的学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史的过往经验证明,政治环境对学术思想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时人皆不敢妄议朝政,唯恐祸从口出而招致灭顶之灾。对于清初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也因此转变风向,逐渐走向了朴实考证经史之路。与文化高压政策相配合,清政府同时采用怀柔手段以开创适应自身的思想文化形式。一方面重开科举考试,另一方面延揽知识分子编纂《四库全书》。凡此种政策,清代学者渐入考据汉学的圈子也是顺理成章。

除去清政府文化政策这一方面的影响,还应注意的一点是明末清初社会巨变所引起的学术发展方向上的影响。“异族”入侵,朝代更替给汉族学者的思想震撼是具有一系列后续反映的,因

“夷夏鼎革”而觉醒的民族意识不仅让当时的学者对宋明理学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而且经反思后产生了要为社会国家的现实要求而发展学术的想法,也就是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这无疑是学术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但囿于思想眼界的局限,他们在对取代程朱理学的新理论的探索上仍专注在儒学这一棵树上。另外,自汉以后,历代学者越发以己意解经而偏离了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所以清代学者在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重视起训诂考据这一恢复经典的学术途径或者说方法,但其本意仍是由考据而明经,由明经而达道,从而重筑理论以挽救社会危机,因而这般宏图大志最终停留在训诂考据的层面上不免令人扼腕叹息。

“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据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考据学这一学术形式,要求比较安定的环境才得以顺利进行,而康、乾、嘉三朝年间,社会安定、物力丰裕,对图书的刊刻、整理和传布大有助力,所以考据学能够在乾嘉年间兴盛至于巅峰,并非偶然所致,也无外乎梁启超能发此言。

1.2 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

《四库全书总目·经学总论》中:“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从儒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训诂之学(汉学)和义理之学(宋学)交替发展——解释汉学兴起的原因。宋明理学起源于应对佛、道心性理论的挑战,以重塑儒家人文精神的信仰。但及至明中叶,理学“空谈误国”弊端显现,一些学者即回到汉唐训诂考据的老路。章太炎认为:“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诗歌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三事皆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远甚。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蹠善矣。”理学发展此时已近枯竭。余英时也表示,宋明理学自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尊德性”的哲学取向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因而才转向了“道问学”的探索。钱穆主张“每转益进”,与余英时一样,以学术思想承前启后的视角看待宋明理学到清代汉学的转变。梁启超则将其概括为“理学的反动”,在他看来,中国学术思想走向了与宋明理学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方面是反理学思潮,另一方面则发展为重实证的考据学。

2 乾嘉汉学的派别及发展

章太炎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的基础上,最早提出将清代汉学划分为吴派和皖派两大流派的创见,并在《清儒》中指

出：“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清代汉学至乾嘉年间臻于鼎盛，梁启超也认为“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开吴者惠，开皖者戴。……当时巨子，共推惠栋、戴震。”

关于吴、皖两派的学术特点和异同，梁启超认为“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章太炎认为吴派“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而“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理，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

2.1 惠栋与吴派

吴派代表惠栋（1697—1758年），字定宇，江苏吴县人。出身于官宦世家，世传经学，受其祖父周惕、父士奇家学影响，十分尊信和推崇汉儒的说经。其言曰：“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3年。]其派治学方法，“凡古必真，凡汉皆好”，这种反宋复汉的“汉学”大旗，虽壁垒分明，使之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但也是这种盲从、偏狭、排斥异己的学术态度使得自顾炎武之时而起的怀疑精神遭受挫败，可谓功过参半。

另一方面，除去对汉儒经说的固守之外，其学术研究还主张对古书的文字、音韵、训诂以求义理，成为汉学家共奉的治学宗旨。对于魏晋以来的对经书牵强附会和随意曲解，他批评道：“盖魏晋以后，经师道丧，王肃诋郑氏而褫郊之义乖，袁准毁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邹湛讥荀诤而《周易》之学晦。郢书燕说，一倡百和，何尤乎后世之纷纭也！”针对这种浮虚玄远的学风，惠栋强调治经必须从声音训诂、校勘考证的基本功入手，在其倡导之下，原是附属于经学研究的“小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清代学术也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即“乾隆中叶，海内之士知钻研古义，由汉儒小学训诂以上溯七十子六艺之传者，定宇先生为之导也。”

2.2 戴震与皖派

皖派代表戴震（1724—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识断精审，是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者。他与惠栋亦师亦友，承其由文字音韵训诂以明义理的主张，尤为强调对义理的重要性。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指出：“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其作

学问，强调“志存闻道”，对大多数汉学家墨守古经传注，绝口不谈义理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除此之外，戴震还重视小学和考据，在音韵、训诂、名物制度、古文献的校勘、考证上有着突出的成就。

对于惠栋及其学派嗜博、泥古的弊端，戴震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钱大昕谓其“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余廷灿谓其“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由此力矫惠栋“惟汉是从”的学术弊端。

3 结语

以儒家经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自周秦以来，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历经汉魏、隋唐、宋元、明清等时期，经学在各个历史阶段，曾呈现不同的特色并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乾嘉汉学是清代最具学术特色、占据重要学术地位的学术派别，它源于明末清初顾炎武等的实学思潮，至乾嘉年间吴派惠栋正式确立，皖派戴震发展至鼎盛。从其兴起到衰落的学术发展脉络来看，一方面受到外在客观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其学术自身的内在发展要求。它对古代典籍的系统整理和传统文化的全面总结，使得中国数千年来的一些学科和领域的绝学得到发掘和彰显，也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意义。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 [2]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3. (08).
- [3] 何刚刚. 从乾嘉汉学论儒家科学精神的兴起——以戴震为中心[J]. 人文天下, 2019(01): 51-56.
- [4] 邵鹏宇. 清代乾嘉学术考据学兴起的原因[J]. 文化学刊, 2016(07): 205-207.
- [5] 李响. 乾嘉考据学成因新探[J]. 科技视界, 2015(29): 150+264.
- [6] 杨婷. 乾嘉学派的产生及其时代精神[J]. 社科纵横(新理论版), 2013, 28(04): 249-250.
- [7] 黄爱平. 清代汉学的发展阶段与流派演变[J]. 中国文化研究, 2001(01): 65-71.